

# The Formation of ‘Black-box Mechanism’ in Short-term Aid-education

## — —An example-based analysis

**Abstract:** Aid-education is a kind of social activity which generally transformed from a spontaneous action to an activity that having gained suppor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us contributes to social welfare. But for the short-term aid-education, it still belongs to volunteer endeavors.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 on the outcome or the narration of the volunteers and consequently ignore the actual process of the short-term aid-education. In this article we had applied the interview method during our qualitative field research and subsequently we issued that the short-term activity mentioned above is a ‘black- box’ out of our perception. Two elements, which is diverse requirements and insufficiency of supervision, altogether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black-box that produces erratic outcomes. Furthermore, we discovered that the short-term aid-education that lack of communication but highly credited weaken the bond between the schools and parents in the rural area, which, however, is not that strong originally. In a conclusion, a third party’s regular supervision is necessary for the short-term aid-education.

**Keywords:** Short-term aid-education, Black-box, Social capital, Credit mechanism

# 短期支教中黑箱机制的形成

## ——一项基于案例的分析

南京大学 周朴凡 李玉婷 陈敏恒

(1. 周朴凡 社会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 210023

2. 李玉婷 社会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 210023

3. 陈敏恒 社会学院, 江苏省南京市 210023)<sup>1</sup>

指导教师: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贺晓星 教授

**摘要:** 支教是在城乡教育差异的问题导向之下, 由自发组织到政府政策引导, 从而形成的一种公益活动, 但短期支教则仍旧属于社会公益的范畴, 近年来饱受争议。既有的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多是从结果出发, 从支教者话语出发, 缺乏对于支教过程的分析。本研究基于访谈和观察, 最终提出, 短期支教过程是一个视域中的黑箱。其形成机制包含两个要素, 即多重矛盾需求和监督的缺失, 二者的综合作用使得短期支教成为了一个输出结果不确定的黑箱。研究进一步发现, 短期支教在这一黑箱过程中, 对于乡村教育中本就不密切的家校联系, 其缺乏沟通机制的高信任度进一步弱化了这一联系, 因此需要第三方的介入与监督。

**Abstract:** Aid-education is a kind of social activity which generally transformed from a spontaneous action to an activity that having gained suppor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us contributes to social welfare. But for the short-term aid-education, it still belongs to volunteer endeavors.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 on the outcome or the narration of the volunteers and consequently ignore the actual process of the short-term aid-education. In this article we had applied the interview method during our qualitative field research and subsequently we issued that the short-term activity mentioned above is a 'black-box' out of our perception. Two elements, which is diverse requirements and insufficiency of supervision, altogether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black-box that produces erratic outcomes. Further more, we discovered that the short-term aid-education that lack of communication but highly credited weaken the bond between the schools and parents in the rural area, which, however, is not that strong originally. In a conclusion, a third party's regular supervision is necessary for the short-term aid-education.

**关键词:** 短期支教 黑箱 社会资本 信任机制

### 一、概述

当下, 教育事业是民生领域的首要大业。自 2003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

---

本文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支持项目《“被支教者”视角下的大学生短期支教: 一种边缘话语的再发现》(G201810284009) 成果之一

<sup>1</sup> **作者简介** 周朴凡 (1998-), 江苏南通人, 社会学大二, 研究兴趣: 政治社会学; 李玉婷 (1997-), 贵州凯里人, 社会学大三, 研究兴趣: 社会不平等; 陈敏恒 (1998-), 社会学大二, 湖北武汉人, 研究兴趣: 教育与社会分层

教育工作的决定》后<sup>2</sup>，乡村教育问题一直得到了全社会持久、广泛的重视。其中，作为对既有人力和教育制度创新和补充形式的支教也应运而生，并蔚然成风。除了广为人知的长期支教以外，逐渐兴起的短期支教也同样值得关注。

一般认为，短期支教是一种短期的支援性活动，既可以被视作教育援助，也可以被视作一种公益活动。近年来，随着短期支教活动在各大高校的广泛开展，引发的争议也逐渐增多，一些研究也聚焦到了这一问题上。如高福霞指出，短期支教活动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要加强支教前的培训和支教后的总结工作<sup>[1]</sup>。李晓璐等人对于支教的对象进行的调查，发现了短期支教活动在地方上存在的家校交流欠缺、与学校课程衔接不妥等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sup>[2]</sup>。张艺、花俊国则关注了边远地区学生受到的心理影响，提出应该通过一些心理活动的形式为他们提供真正的帮助<sup>[3]</sup>。总的来说，这些讨论具有显著的“问题导向”，即更关注短期支教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问题的原因以及对策研究。

本文认为，“问题导向”的研究无法深刻地认识今天的短期支教。既有的研究大多是从支教者视角出发，而被支教者则完全属于失语状态。这一背景下的问题导向型研究注定是无法还原支教过程，从而抓住其症结所在的。

学者刘尧提出<sup>[4]</sup>，教育过程可以被视作一个控制论黑箱。即可视的只是教育的输入和输出，而有关其质量的教育过程则处于黑箱状态的。在这一视角下，既有的支教问题的研究，以及有关的教育理论所关注的大多是教育输出的结果，如质量、影响等等，并试图从结果中总结出一些操作上的方法，却并未展示这一黑箱运作的可能过程。我们认为，教育过程，特别是支教过程，并非一个实然的黑箱，即其通往教育质量的转化过程并非不可知的。但是，支教过程属于一个视域中的黑箱，即其过程由于种种原因而置于盲域。通过对被支教者的关注则能够帮助我们从教育黑箱的视角出发，关注支教过程，并进一步探讨：被支教者的话语能否展现我们研究视域中缺失的支教过程的部分面貌？这些缺失的面貌能否揭示黑箱产生的机制，并为我们改进短期支教提供一定的借鉴？

##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为案例研究。我们选取的案例为 P 支教队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 W 村 L 小学开展的支教服务。从服务对象上来讲，W 村的确属于支教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据公开资料显示，W 村 2011 年的人均纯收入为 760 元，远低于 2011 年的贫困标准 2300 元。村内 L 小学共有教师 9 人，其中四人为大学学历，二人为大专学历，剩余三人为中专学历，且有三人毕业于音体美类专业，但同时承担着日常主课（语数外）的教学任务。<sup>3</sup>而从 2017-2018 学年度第一学期学生期末考试及格来看，全校整体及格率 63.6%，其中部分年级总分及格率仅有 40%。可以说，W 当地经济状况贫困，教育资源也十分欠缺。

而 P 支教队，则是由多所高校大学生组织的支教服务团队。根据前期了解，该支教队中大多数成员属于除此参加支教活动，但也有少数成员曾经参加过支教服务。因此，P 支教队的情况符合今天大部分大学生支教队的状况。同时，P 支教队属于独立开展活动，在活动筹备阶段并未受到一些资方或者公益组织的干预。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大学生对于短期支教活动的认识。

在对案例的具体研究中，我们主要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通过对于学生、支教者和家长三方的半结构访谈，尽可能地了解他们对于支教活动的认识。我们从学生和支教者中分别抽

<sup>2</sup> 见 2003 年 9 月 17 日，国发[2003]19 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sup>3</sup> 参考雷教科发【2017】165 号文件附件。

取了部分对象进行访谈。对于支教者的抽样主要结合了其所任教的科目，以及在支教活动中担任的不同角色因素。而在学校参与活动的学生中，由于有较多学前班与一年级儿童，考虑到表述能力，我们无法按照低、中、高三个年级学生人数比例进行抽样。我们最终对 3 名低年级学生、2 名中年级学生和 8 名高年级进行了访谈，并对每一个受访学生的家长开展了访谈工作。这 13 名学生中，包含 3 人总分不及格，考虑到有一些成绩较差的同学未到校参加支教活动，我们认为这一抽样在成绩分布上比例合理。此外，根据家访观察，这 13 名同学的家境基本覆盖了平均意义上的贫困户到富裕户。而根据家访结果，这 13 名同学的父母包含了一方在家、均离家务工、均在家三种类型。根据当地文件<sup>4</sup>，L 小学共有“阳光儿童”（即留守儿童）19 人，占学生总数比例为 28.8%。而在我们抽取的 13 名访谈对象中，共有四名“阳光儿童”，占比为 30.7%。因此，我们认为这一抽样在家境分布上也是合理的。

### 三、案例分析

#### （一）多种需求的产生

P 支教队在前期筹备中体现出的自我定位是“在给孩子们带去知识的同时，培养他们健康的身心和学习生活态度”，即核心在于强调自己作为“教育者”的社会定位，这和官方的宣传——即“支援教育”——几乎完全一致。然而，从实地观察和访谈中可以发现，整个支教过程中，“被支教”一方对支教的理解和需要完全不同于支教一方，且其需求多样；P 支教队成员内部，对于支教本身和“支援教育”的理念均有不同理解。在校长、学生家长、学生以及支教队员之间，支教宛如“罗生门”。这些话语的差异背后，实际反映的是在二元结构下不同主体在农村教育这一“选拔机制”中的需求差异。譬如，在 W 村小学校长看来，支教是为了拓展视野：

*“我要求他们把读书的经验和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和山里的孩子讲一下，增长见识。主要是观念。补课是另一回事，和支教不一样。希望支教的同学起到榜样的作用。”*

他提到的“补课”，也是 W 村家长对支教的印象和期待。在对 12 户家长的访谈中，有 8 户学生家长认为这些大学生来到 W 村小学是为孩子们“补课”和“辅导作业”，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成绩的提升。这种印象与 P 支教队早期的入户宣传有很大的关系，除此之外，也是家长在学校教育中“不介入”的间接佐证。

L 小学的学生都是在学期末考试结束、返校领成绩单那天得知寒假期间的支教活动的信息，校长通知学生自行告诉家长并自主决定是否参与。从一开始，当地学生对“支教”几乎是一无所知的状态，访谈中一位六年级的学生如是说：

*（问）你是怎么跟她（妈妈）说的？*

*那时候不知道，就以为是补课，就跟她说补课。*

*（问）那你现在发觉不是补课吗？*

*不是，很快乐…就是学习和那些玩的分开来。*

普遍来说，学生们一开始没有对“假期补课”有多大兴趣，对于年纪小的孩子来说，报名参加支教的理由更多是“家人说让我去”、“在家待着也是无聊”、“听说有大学生哥哥姐姐”、“我们同学都去了”。从回答中看，他们也并不完全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整个“教育过程”的意义。但后面的事件表明，即使他们无法完全理解，但可以自己创造需求和意义。比如，某案例中学生 H 以老师要求到校为由早早地离家到另一个孩子家玩耍，而家长因为孩子没吃早饭便到学校里来找支教者。很显然，孩子利用了家长对于支教者作为“教师”的信任，

---

<sup>4</sup> 文件同上

满足自身的某些需求，而这成了支教活动之于他们的意义。

我们随后发现，P 支教队员的叙述中也无法得到一个对支教认识的答案。在 P 支教队的成员选拔过程中，备课能力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而志愿者对“支教”目标的理解是否一致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只要“能吃苦”、“能上课”就行。而队长本人对支教的理解，是相当模糊和矛盾的：

*（问）那你觉得支教这件事的价值在哪里？*

*说实在的，我也很纠结…之前暑假不是在 M 村那边做支教嘛，当时只是一个志愿者，做了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现在自己组织，觉得不是那么…我很迷茫。*

P 支教队长作为大学生，也是该组织的创立人，他对于支教活动的“意义性”是不假思索的，而这种意义思考上的模糊与缺失并不影响其对于支教活动的统筹安排。其他的志愿者评论“他在宣传上花了很大工夫”。但在其他支教者那里，支教可能有不一样的目的和意义。

H、D、Y 等多位志愿者都分别在访谈中聊起自己对支教的理解和期待，而这些关于支教的叙述之间差别极大。H 笼统地觉得支教是“做好事”的范畴，而在 Y 看来，或许这就是一件“没那么有意义”且让孩子们多走山路的事；D 和另外的志愿者觉得，支教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自我表达、快乐”或“增长见识”，但如果按照另一位接受访谈的志愿者 L 的标准来看，因为无法传授成体系的知识，支教确实就是“没什么用处”的。这种有关“快乐”的表述更可能是合理化自我行为的叙事。队员们对支教的看法差异悬殊，但却形成一种共识——支教并不能给孩子们带去知识，而这恰恰是不能公开谈论的，它不仅满足不了当地家长的需要，也与其组织本身的定位冲突。

总的来看，在 W 村小学的支教活动中，呈现出各主体内外需求的不一致性乃至矛盾。随后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在 W 村小学支教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的需求背后可能的共存机制，从理论的角度探讨各个主体介入 W 村这个教育“黑箱”的过程和差异。

## （二）介入的不足与义务创设的失败

科尔曼对教育的描述中，家长和学校之间的纽带是一种社会资本，这属于他笔下的“义务与期望”形式。在这一家校的互动过程中，学校教师拥有人力资本，家长可以被认为拥有物质资本，而两者之间的纽带就是社会资本。而如果家校间的纽带较强，那么家长动用学校资源实现某些教育目标的能力也就越强。此外，学校还承受着来自家长的委托和信任，需要教育学生以满足家长的期望<sup>[6]</sup>。这种信任和义务关系同样适用于我们所研究的在 W 村开展的支教活动。我们将在这一框架下对短期支教中的家校关系加以考察。

在 W 村，支教者和被支教者之间的关系基本是单向的，即支教者可以动用家长的资源，如请他们到校或去家中招生，但家长几乎无法动用学校和支教者的资源，甚至对其活动一无所知。如在对一名支教者的访谈中：

*（问）那你有了解家长的想法是什么吗？*

*之前去家访的时候他们……然后就希望我们来管住他们，然后他们能做自己的事情。*

*（问）就是家长实际上也并不清楚孩子在学校做什么事情？*

*对。都只知道是补课。*

当地学生在访谈中同样表示，家长并不知道自己在学校干什么，最多只知道是在“补课”。而事实上，W 村的 P 支教队主要开展了一些课外活动，并非辅导作业或者补课。这种单向关系中的信息障碍便造成了不少误会。一位支教者表示：

*他们去刘 xx 家里家访，他爷爷就说他在家不写作业，要把学校留给他的寒假作业放在最后写。说是要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先写。但是我并没有布置任何的作业。*

可见，即使当地家长和支教者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弱，但是他们对于支教老师实际上是充满信任的。孩子以支教老师为借口提出的要求基本都能得到满足。

那么这种信任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认为，可以归因于三个要素。首先，对于支教者的信任本质上可以归于对抽象体系的信任。由于 W 村较为闭塞，村民教育程度低，因此对于教师较为尊重。因此，来自山外的大学生“老师”更是得到了当地人格外的信任和尊重。当地人在得知支教的大学生是“老师”后，几乎都没有表示任何怀疑。归根结底，他们所信任的是知识、是教师群体，也就是所谓的现代的专家信任<sup>[5]</sup>。

但我们需要注意到，对老师的信任并不是完全只有现代特征信任，传统的熟人社会中建立起的信任同样重要，即二者相结合。在当地家长和学生的讲述中，我们注意到有几位学校老师因其业务能力普遍遭到了质疑。也就是说，在熟人社会中，即使老师代表知识的体系，其所拥有的信任也会因他的表现而被逐渐解构。而相反地，在家长心中留下好的印象则无疑有助于增加信任。支教者通过入户招生在家长心里树立了较好的印象。而“城里来的”也同样是一个加分项。此外，学生同样能够传递信任。由于当地的老师普遍习惯打骂学生，因此，支教者更容易获得学生的喜爱，而这种评价也增加了家长的信任。总之，这一部分的信任来自良好的印象管理。

其次，传统型模式逐渐扩大其影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时间。而短期支教在其活动时间内，很难出现所谓“交汇口”，即非专业个人和抽象体系代理人之间互动的节点。只有在各种交汇口上，抽象体系带来的信任才可能被它的代理人削弱。例如，学生反映当地老师在考试中协助作弊，进而瓦解了当地老师的形象。而短时段内的支教暴露出这种危及外界对其信任度的“交汇口”的可能性很低，这也是支教者拥有来自家长较高信任度的客观条件。

总之，家长对支教者存在着较高的信任，而他们也把孩子委托给了支教者。在家校纽带中，作为社会资本前提的信任条件已经具备，因此我们接下来将要考察义务的创设能否完成。

在 W 村的支教活动中，家长的信任并没有给支教者创设义务。在这段委托关系中，家长越信任，越不可能介入学校的事务，因此首先他们无法监督支教者能否履行他们在这情境中的教学义务。其次，支教者本身并不属于教育体制中的任何一份子，其以“老师”的身份进入现场，但是并没有老师的身份认同，也不认为自己扮演的是一个教书的角色。如在访谈中，多人承认自己能做的只有“陪伴”或者“开拓视野”，而不能“传授知识”。因此，他们否认了这段委托关系中自己本应当承担的义务。总的来说，支教者身上有可能出现角色偏差，而来自家长的信任则为角色偏差创造了空间。

而另一方面，城乡之间巨大的环境和教育配置差异，使得乡村地区的家校联系并不密切，并反过来又导致家长（parents，指父母）与当地学校教师之间缺乏联系，并最终形成一种包含二消极主体的习惯，即家长在单向信任的基础上不会主动与老师联系，而老师更不会主动联系家长。从家长方面来看，由于家长长期的不在场状态（如外出打工），以及子女就学地点的不稳定性，导致家长无法建立起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从而使得子女成为了家校沟通的唯一媒介：

（问）平时就他（学生）一个人在家吗？

没有，有些时候，他自己在家，我不怎么在家。……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怎么问他。因为我对他比较，有时候太严厉了，有时候他跟我不怎么熟，他什么话都跟他奶奶说。

可见，乡村地区学生的父母长期缺乏与校方、子女的交流，对于学校的教学情况知之甚少，而基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交互的对话义务，却常常由父辈转移到祖辈或近亲身上，譬如子女的大伯、姑妈之类，由此家长实际上将这种沟通机制的建立权转嫁到子女的非直系亲属身上，而这种非直系亲属关系所带来的责任感强度、以及子女家长不定期地进入家校关系之中，并不能促使临时监护人们主动建立长期稳定的对话机制。而这种形成习惯的对话机制缺位便在支教活动中因为上提到的信任机制而进一步放大。

于是我们看到，在 W 村支教活动中的家校纽带并没有形成一种双向的社会资本。长期形成的习惯中，仅存在着较强的“教师—学生—家长”的信息流动顺位，而反向的沟通则十

分微弱。而到了支教活动中，高度信任的建立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不平等。认知不对等背景下支教者身上的角色偏差意味着义务的创设并没有完成，家长也没有获得实质能够动用教学资源的社会资本。于是，受教育者在支教活动中的零介入、零资本成为了一种必然。

## 四、总结与回顾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短期支教活动中蕴藏着多种需求。这些需求之间往往彼此矛盾且无法打通。而在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支教地的家校之间都处于一种较少沟通的状态。而支教者则凭借着文化资本、印象管理和短时间优势获得了家长较高的信任度，于是家校间本就微弱的纽带在高信任度下被进一步弱化，而支教老师应有的义务便无法在零监督的状况下被创设起来。最终，介入与监督的缺失造就了短期支教活动的黑箱状态，而多种需求则影响了这一教育过程的输出结果。于是，两者作用叠加之下，短期支教呈现出了今天或为人指责或得到赞誉的多种面貌。而要为以后的短期支教活动提供指南，同样需要从多种需求与介入缺失两个角度出发，从使黑箱透明化入手，来改善短期支教活动的状况。

参考文献：

- [1]高福霞, 万小煌, 陈丽娟, & 王晓春. (2014). 大学生短期支教的现状及其对策. 河北职业教育, 10(9), 142-144.
- [2]李晓露, 吴美茹, 华方园, & 李拴王. (2014). 大学生短期支教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及改进策略探析——以陕西省为例. 教育评论(10), 75-78.
- [3]张艺, & 花俊国. (2016). 大学生短期支教中对农村学生心理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以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为例.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32(5), 50-54.
- [4] 刘尧. (2017). 教育质量黑箱及其开启之道. 青岛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版)(4), 92-97.
- [5]安东尼·吉登斯. (2000). 现代性的后果.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6]詹姆斯·S·科尔曼. (1999). 社会理论的基础.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